

YIHETUAN
YANJIUHUI
HUIKAN



1988

义和团研究会

義和團研究會
會刊

义和团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特辑

目 录

在义和团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丁名楠 (1)

威海市市长门兆英同志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1)

会员代表陈振江同志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2)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理事会工作报告..... 徐绪典 (3)

在义和团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李 侃 (5)

理事长、副理事长、常委理事和理事名单..... (6)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章程 (7)

※ ※ ※ ※

景善日记是白克浩司伪造的丁名楠 (8)

关于义和团源流研究的几点体会.....程 啸 (13)

关于义和团与白莲教关系的几点看法..... 郭墨兰 (17)

教会、教民和民教冲突	徐绪典 (22)
梨园屯教案和义和团运动	张守常 (27)
义和团运动中的“假团”问题	李文海 (31)
真假义和团探析	陈振江 李喜所 (37)
义和团是否反封建	陈贵宗 (38)
也论义和团“奉旨造反”的问题	廖一中 (41)
朱红灯领导的义和拳斗争中几个问题	陆景琪 (45)
论袁世凯对义和团的态度	李德征 (48)
民族资产阶级与义和团运动	骆宝善 桑 兵 (52)
论义和团时期沙俄同英国的在华争斗	吴士英 (58)
《清德宗实录》、《拳时上谕》与《义和团档案史料》	林树惠 (62)
马克·吐温、传教士与义和团	顾长声 (64)
※ ※ ※ ※	
廊坊地区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续完)	(66)
河北威县义和团调查记	商鸣臣 于家福 (97)
启事	(102)

在义和团研究会会员代表 大会上的开幕词

丁 名 楠

各位同志：

义和团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

我们这次会议有两个任务：一个是检阅两年来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中的成果，讨论、交流研究心得；一个是总结近两年来义和团研究会的工作，研究今后开展工作的方法，并改选研究会的理事会，产生新的领导机构。

我们是在党的十二大召开的同时来召开我们的会议的。我们历史工作者要响应党的号召，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作出自己的努力。我们要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搞好我们的学术讨论；我们也要本着团结合作，以有利于推进义和团运动史研究水平的精神，来搞好理事会的改选工作。我相信，在各位代表同志的努力下，我们这次会议的两项任务是一定能够顺利完成的。

我们能够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威海市来开会，是与威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我们应当向威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

预祝会议成功！

威海市市长门兆英同志在 开幕式上的讲话

各位代表：

义和团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今天在我市举行，我代表中共威海市委、市政府表示热烈的祝贺和欢迎！

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全国各地。你们是学者、专家、教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者；你们在发展社会科学、创造精神财富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你们这次来威海，带来了全国各地建设两个文明的丰富经验，又能够对我市各个方面的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宝贵意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大家远道而来，欢聚一堂，在“双百”方针指引下，研究义和团运动史，探讨学术上的

问题，这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尽力为大会做好服务工作，保证大会开得圆满成功。不过，威海这个城市很小，条件有限，无论在生活安排上，或在服务工作方面，都会有不少问题，希望大家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改进我们的工作。

党的十二大刚刚开过，我们都在学习十二大文件，祝大会在十二大精神指引下胜利地完成大会的各项任务。

预祝这次代表大会开得圆满成功。

会员代表陈振江同志在开幕式上的发言

同志们！

我代表义和团研究会会员，向这次代表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们对义和团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辛勤地指导、支持和组织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两年来，第一届理事会为推动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工作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山东地区的同志们付出了更为艰辛的劳动。在他们齐心协力、团结合作的艰苦努力下，举办了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义和团研究会会刊》，编辑出版了《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集》，沟通了全国各地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工作的情况，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两年来，全国许多报刊发表了一大批研究义和团运动史的文章，出版了一批有关义和团的资料和专著，更为可喜的是，近几年来，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队伍正在迅速发展壮大，其中有功力深厚的老同志，也有许多思想活跃、肯于攀登科学高峰的中青年同志。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扩大了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领域，提出并论证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还发掘了不少的新资料，这就大大地开阔了同行们的视野，活跃了人们的思想。这些正是我们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工作兴旺发达的标志。

在义和团研究工作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认识和争论，这正是义和团研究工作深入的表现。我们感到，正是这些不同见解的争论，才使人们得到了非常有益的启示，进一步推动了我们的研究工作向纵深发展。应当说，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

今天，当我们热烈庆贺第一届理事会胜利完成他们的光荣使命的同时，我们预祝即将产生的新的理事会继往开来，把我们的义和团研究的学术水平进一步的提高。我们感到，在今后的研究中，不但要注重研究义和团运动史的具体历史问题和历史现象，还要大力提倡和推动有关义和团研究的方法论和理论问题的探讨，使我们的认识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下逐渐统一起来。我们深深感到，义和团运动的时间虽然是短暂的，但是这场运动的矛盾现象却是十分复杂的。因此，这就急切的需要我们的同行们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更好地掌握科学的方法论，以便准确地把握和分析各种矛盾现象，得出比较确切的、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

义和团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是集体的事业，需要各地的同行们团结协作，共同努力，不断地提高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水平。因此，我们希望即将产生的新的理事会，能够创造条件、提供方便，加强地区之间的协作，使我们的研究工作进一步的活跃起来。

最后，预祝这次大会圆满成功！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理事会工作报告

徐 绪 典

各位代表，各位理事：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从1980年11月20日在济南成立以来，已经有一年零十个月了。研究会成立后，推出58人组成理事会，又由理事会选出正副理事长和六人组成的秘书处，处理日常事务。研究会取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批准和活动经费，又得到各有关单位的支持，使会务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现将这段时间内所做的工作汇报如下：

一、会务工作

本会的任务，根据我们的章程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从事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开展百家争鸣，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我们的会务工作就是如何体现上述的要求。作为一个民间学术团体，我们的工作主要应当放在组织、宣传、推动、交流和出版等方面。

1980年12月26——29日，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正、副理事长和秘书处的同志在北京开会，研讨了工作计划。一年来按计划分工负责，积极进行。我们认为研究会的重点工作之一应当是筹备1982年的会员代表大会，而筹备工作除了联系地点等事务工作外，主要在于抓研究论文。通过1982年的大会，希望能够推进我们的研究水平提高一步。为此我们分别做了工作，组织了若干篇论文，为1982年的会议做出充分准备。

为了研究会工作的开展，有必要和理事长及在京秘书共同商讨，副理事长曾两次赴北京，一次在1981年8月，另一次在1982年1月。理事长也来过济南一次，处理会务。在长春和天津的秘书，我们用通信联系，征求他们的意见。总之，我们为了开展义和团史研究这一目标，同心协力，克服一切困难，力图把会务工作做好。在这里应当特别提出的是，秘书处的同志为了会务工作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二、学术活动

研究会所组织和推动的学术活动，除了上述准备1982年会议的活动以外，主要的是以召开座谈会的形式，展开百家争鸣，活跃学术风气，推动研究的进行，提高研究的质量，同时这也是为1982年的会议做准备。

1981年12月2日，义和团研究会与山东史学会共同邀请省内部分史学工作者在济南举行座谈会。会上，大家回顾了八十年来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和义和团研究会自去年十一月成立以来的工作，并重点讨论和交换了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意见。这次会议对我们今后工作给予很大的启发，使我们的研究方向和重点更加明确。

1982年3月23日，山东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室召开一次义和团运动史讨论会，会上宣读和讨论了一组论文。从论文的内容上来看，大体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有关山东义和团史的研究，另一类是有关义和团时期的中外关系问题。这次讨论为提交1982年会议的论文做了

准备，并通过集体讨论提高了论文的质量。后来，以这批论文为主，编成《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论丛》，提交会员代表大会作为参考材料。

三、出版刊物

义和团研究会在济南成立后，即积极准备出版刊物。为了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发扬学术民主，促进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发展，更好地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本会决定编印《会刊》，一年两期，作为我国史学界探讨义和团运动史的有关专题、交流资料和检阅研究成果的园地。由秘书处同志轮流担任责任编辑，徐绪典担任总的负责人。

1981—82年两年来出版了四期《会刊》，内容包括：通讯、报道、论文、书评、翻译、史料、目录等等。《会刊》的出版，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认为对义和团史的研究起了一些交流、倡导和参考的作用，同时也活跃了研究气氛。

四、学术交流

义和团史研究会成立以来，对国内外学术机关和个人进行了广泛的联系。我们的理事会包括高等院校33人，研究机关17人，报刊出版社6人，其它方面2人。参加1980年大会的有美国五所大学，加拿大两所大学，澳大利亚一所大学，日本一个研究机关。我们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了不断的联系。

研究会为筹备1982年会员代表大会和国内各理事来往通信七十余次，详细协商如何开好这次会议。我们研究会的各项活动，也在国内报刊上多次报道。徐绪典等分别在美国和日本刊物上介绍了国内研究义和团运动史的动态和成就。

五、资料工作

本会为便于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者的查阅和参考，决定编辑《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该书将收入自从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直至1981年8月有关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论文，以反映八十年来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状况和当前的研究水平。已由徐绪典提出初选目录，寄交全国各学术单位，征求意见。后来，陆续收到各方来信，提出不少建设性意见。现正考虑各种意见，修订初选目录，并决定将所收论文延至1982年会员代表会时期，以便吸收最新研究成果。

六、一年来国内研究成果

1980年11月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在济南举行，同时义和团史研究会正式成立。以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国内各报刊上发表的论文、述评等约计九十篇（截止到1982年6月份），体现出实事求是、百家争鸣的新精神。义和团史的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国内出版的或正在刊印的各种资料、专著也是琳琅满目。在档案方面，已出版的有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科院历史所选编的《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1981年辽宁人民出版社），董果良译的《1900—1901年沙俄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二编（1982年齐鲁书社）。正在刊印的有天津社科院历史所译的《美国外交文件》（齐鲁书社）。正在编辑、翻译中的有东北师范大学王魁喜译的《日本外务省档案》，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辑的《筹笔偶存》（山东巡抚衙门经办的洋务交涉文牍），四川社科院编的《四川义和团档案资料》，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人民大学编辑的《义和团档案史料补编》，第一历史档案馆与福建师范大学合编的《近代教案史料》，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编辑的《盛档中的义和团资料》。其它方面的资料，还有近代史所编辑的有关义和团资料正在刊印中。

专著方面，有廖一中、李德征、张旋如等编的《义和团运动史》（1981年人民出版社），黎光和张旋如合写的《义和团运动在东北》（1981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张力撰写的《四川义和团》（198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

选编方面，已出版的有《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982年齐鲁书社）。正在编辑中的有徐绪典主编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论文选编》和《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辑》。

翻译方面，已选出柏塞尔著《义和团起义——背景的研究》（1963年剑桥大学出版）一书，正由山东师范大学李金声在翻译中。

七、经费开支

1981年中国社科院规划局批拨研究会活动经费2,000元，会刊出版费（第二期）、印办公信封信纸、邮寄费、座谈会费等项共支出1650.36元。第一期会刊费八百余元已由山东大学科研处代付，所以1981年经费结余尚有349.64元。1982年因有会议，活动经费增为4,000元，除年会开销外，还有两期会刊印刷费和其它费用，等年终结算再行公布。

1981—82年以来，义和团研究会在各方支持下，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做得很不够。我们的工作可以说刚刚开始，如何今后更好地开展这一工作，请各位同志给予批评和建议。现在正当我们进行理事改选的时候，希望在下届新选出的负责同志主持下，取得更多的成绩。

在义和团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 上的闭幕词

李 侃

各位代表，同志们：

我们这次会议从9月13日到18日共开了6天。到会代表63人，男60人，女3人，来自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东、江苏、河南、安徽、宁夏、新疆、云南、广东、北京、上海、天津15个省、市、自治区。共收到论文36篇。会议期间，听取并审议了上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徐绪典所作的两年来工作情况的报告。一致认为，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成立以后的两年中，做了许多工作，对于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开展，起了很好的组织和推动作用。对正、副理事长和秘书处同志的工作，感到满意。

会议期间，还就义和团的源流等问题，以及研究义和团运动的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论文和讨论发言中，都提出不少新的课题和新的见解。说明了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正在深入开展，成绩是显著的。

会议期间，还参观了中日甲午战争的遗迹刘公岛、龙须岛成山头，使大家受到了一次生动而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中日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敌勇士的英勇反抗和牺牲精神，更增加了真情实感。

这次会议还选举了新的理事，修改了章程。新的理事会按照新修改的章程，推选了常委

理事（5位），聘任了5位秘书。同时还决定，下次代表大会（也是学术讨论会），1985年在天津或其他适当地点召开。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到会代表都表示非常满意。会议开得很成功，主要是由于全体代表的支持和努力。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山东大学、山东师大、山东社科院的有关各位同志尽了很大的努力。会务组的同志为筹备和召开这次会议，不辞辛劳，苦干实干的作风，赢得了到会全体同志的赞扬。

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威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同志，他们给了我们大力支持、热情帮助，给我们开好这次会议提供了极好的条件。

我们还要向烟台港务局的领导同志和有关同志表示深切的感谢。感谢他们给了我们许多帮助，帮助我们解决了不少实际困难。

我们还要向会议的全体工作人员，向东山宾馆的领导和全体服务员同志，表示深切的感谢。感谢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和很好的服务。

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在庆祝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日子里，我们怀着喜悦振奋的心情，在秋高气爽的季节，在黄海之滨的幽美城市、英雄城市——威海，开了这样一个令人难忘的学术会议。

我们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要在党的十二大文件精神的指引下，紧紧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贡献自己的力量。可以预期，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工作，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在我们向难忘的威海告别的时候，祝愿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工作顺利，业务丰收！现在我宣布大会胜利闭幕！

理事长、副理事长、常务理事和理事名单

理事长：丁名楠

副理事长：徐绪典

常务理事（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名楠 陈振江 胡滨 徐绪典 戚其章

理事（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名楠	王守中	王魁喜	朱金甫	乔志强	苏昭民	李侃
李文海	李德征	张力	张守常	张海鹏	张寄谦	阮芳纪
林言椒	林敦奎	陆景琪	陈贵宗	陈振江	金冲及	金家瑞
胡滨	顾长声	徐绪典	戚其章	程虎啸	路遥	廖一中

秘书处：

理事会聘请以下同志组成秘书处：

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吴士英（山东大学历史系）

郭大松（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王如绘（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章程

(修改草案)

- 一、本会定名为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为各地史学工作者自愿建立的群众学术团体。
- 二、本会宗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贯彻双百方针，促进义和团运动史研究水平的提高和研究力量的壮大，为繁荣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科学做出贡献。
- 三、凡从事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教学工作者，由本人申请，一名理事介绍，并填写会员登记表者，即可为本会会员。
- 四、本会设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理事会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决定本会各项工作任务，提出有关义和团运动史研究方向和任务的建议。理事会闭会后，由常务理事会执行理事会提出的任务，研究有关本会建设的重大问题。常务理事会推选正副理事长各一人，主持会务，并设立秘书处，处理日常工作。
- 五、理事会每两年改选一次，正副理事长及常务理事连选连任，连续任期不超过两届。
- 六、本会活动经费由常务理事会负责向中国社科院申请，并接受有关单位和会员个人赠款。
- 七、本会联络地点设山东大学历史系。

景善日记是白克浩司伪造的

丁 名 楠

1981年秋冬之交，我去英国访问，曾到伦敦英国图书馆东方书籍及手稿部借阅景善日记原稿本。这份稿本是《慈禧外纪》(China under Empress Dowager)一书的作者之一濮兰德(J. Bland)征得另一作者白克浩司(E. Backhouse)的同意，于1910年8月存放于英国博物馆的(英国图书馆现已从博物馆独立出来)。据白克浩司说，景善日记是1900年8月18日，即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的第三天，正当英国锡克兵在景善住宅大肆掠劫时，他本人在景善书房里得到的。现在收藏在英国图书馆的即是由白克浩司翻译成英文，经濮兰德润色、在《慈禧外纪》一书中刊出的那一部分景善日记原稿，共三十九页，一万五千四百多字，纸已呈暗黄色，裱在长卷上，置于一个狭长的小盒里，编号为110, 92C/2 Y, OR62 A。盒内还有两封信，一封是1944年12月26日濮兰德致东方部主任翟林奈(Lionel Giles)的，另一封是《北京的隐士——白克浩司的隐蔽生活》一书作者、牛津大学近代史教授特雷福尔—罗泼(Trevor—Roper)1975年9月5日给东方部负责人纳尔逊(Nelson)的。前一信还附有白克浩司1937年4月写的关于发现景善日记经过的详细情节，作为《慈禧外纪》的补充说明，用以证明日记是真的不是假的^①。在后一封信上特雷福尔—罗泼直率指出，白克浩司的说明全是空想，毫无价值。他说：“白克浩司本人伪造了这个文件。这不是他伪造的唯一东西。”

关于景善日记真伪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景善日记是《慈禧外纪》一书的第十七章。日记始于前一年腊月二十五日(阴历)，止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断断续续，近七个月的时间里，一共约有三十天。《慈禧外纪》于1910年10月在伦敦出版后，风行一时，被誉为记述清末历史最饶兴味之作。同年11月、12月各重印一次，此后好几年里不断再版，并译成德、法、日本等多种文字发行，1914年又印了一版普及本。该书刚问世，英国泰晤士、每日电讯、观察家以及每日纪事报等竞相推荐，李薇孙(W. Leveson)更撰文对日记高度赞扬，称之为“无价之珍”。^②解放前被奉为圭臬之作的美国人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共第三卷第八、九、十各章，将景善日记作为可信的史料，加以引用。1924年，荷兰汉学家戴文达(J. Duyvendak)又将景善日记重新译成英文，与录出的原文辑成单行本发行。他对白克浩司的译文提出批评，指出它擅改月日，强事割裂和任意增添，不忠实于原作。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 Pelliot)和德国学者查赫(Von Zuch)推崇戴文达的译文，伯希和还认为景善日记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文献。^③由于这些人的吹嘘，景善日记的地位和史料价值愈益提高。

在对景善日记的一片赞扬声中，并不是没有不同的音调的。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G. Morrison)、英国公使朱尔典(J. Jordan)、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赖德烈(K.

Latourette)都对景善日记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莫理循说日记是白克浩司在他的满人教师帮助下伪造的。④朱尔典一直认为日记是巧妙的虚构。⑤赖德烈在他所著《中国人，他们的历史和文化》一书引用书目中，也提出批评意见。濮兰德认为它含有恶意，声言要对赖德烈申诉，迫使他的出版商在以后各版中删去对它的评语。⑥

1936年，在上海从事新闻工作的英国人刘逸生(William Lewisohn)在《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刊出《对所谓的景善日记的一些批评意见》，从日记发现经过、外形、内容三方面立论，断定它是伪造的。他说他仔细研究了景善日记，并与同时有关的中外记载相对照，对日记中多处出现的预见、矛盾和错误，感到吃惊。它不是真的，因为同景善这样一个人的身份不相称。结论是它不是一个人的日记，而是两个以上的人的记述合编，在事情过后的一个时期内搞出来的。至于何故，何时，何人把这些记述弄成日记的形式，他还不能确说，所关心的仅仅是：第一，它不是真的日记。第二，它不是景善所作。这篇文章对景善日记作了全面、系统的评述，引起人们的注意。

第二年，戴文达也在《通报》上发表文章，改变了以前坚持的日记是景善所作的意见。以为景善日记照现有的形式，“不能是真的”，“不过是巧妙的文学虚构”。但他仍然相信白克浩司在景善家里确实发现日记的说法，企图将景善日记是伪造的和白克浩司发现日记的情节是真的调和起来。

1940年，程明洲在燕京学报发表了《所谓景善日记者》一文，吸取了前人特别是刘逸生的一些重要论据，并对景善日记作了深入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景善日记是伪造的。从内容看，列举它同史实不符的大小错误共有二三十处；从日记的文笔和书写的手迹来看，认为景善翰林出身，多次充任考官，理应擅长文墨，谙熟典故，但日记中“文笔粗陋，章法纰缪”，“偶引古典，每多谬误”；景善又以工苏体字知名，但《慈禧外纪》插图上印出的字迹，却“运笔枯涩”，足证日记决非出于景善之手。作者指出日记“殊多左袒荣禄之嫌”，而“以”字的特殊用法上百处，有点像日文章法。他联系白克浩司对日文曾下过功夫，得出的结论是这份日记是白克浩司伪造的，意在为荣禄辩护。这是一篇有分量的辨伪文章，其中有些论据特别他指出的史实方面的错误，基本上是站得住脚的。

1977年纽约出版的弗雷福尔—罗泼的专著《北京的隐士——白克浩司的隐蔽生活》，对了解白克浩司的为人很有用，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判定景善日记是伪造的。在未读这部专著以前，对白克浩司所知不多，只知道他是汉学家，1900年在景善家里发现一部日记，据说曾在京师大学堂教过英文，还把一批中国古书和善本书捐赠给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等等。弗雷福尔—罗泼的书告诉我们许多前所未闻的事。原来他是纨绔子弟，出身贵族，父亲是英国一家大银行的董事。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显出学习语文的才能，但生活腐化，欠了很多债，因躲避债主，没有毕业，就逃居国外，一走了事。他同全家的关系一直不好。1898年来中国，在英国使馆当翻译生。当时莫理循的名气很大，但不懂中文，也不会说中国话，白克浩司帮他工作多年。1900年8月，联军攻陷北京，大肆掠劫，白克浩司占据了景善的住宅。后来通过他父亲的关系，被一家英国大造船公司约翰·布朗公司(John Brown & Palmén Co.)聘为驻中国的代理人，但多年没成交一笔生意。他一心想做牛津大学的中文教授，为此送了一大批书给波德林图书馆。牛津大学也曾考虑聘请他任教，由于欧战发生，推迟并终于取消对他的任命。欧战爆发后，英国到处搜罗军火，也想在中国收购

枪支。白克浩司是一家英国大造船厂在华的代表，又是有点名气的汉学家，这些身份有利于掩护他从事这项工作。英国政府于是委派他在中国秘密收购枪支，只有公使朱尔典和使馆另一名高级官员同他联系。他玩弄了不少花招，搞了许多假报告，一度取得英首相、外交部和国防部负责人的信任。但结果一支枪也没有弄到手，事情终于被戳穿，朱尔典因此受牵连，被召回英国受审查，但白克浩司却逍遥无事，不受任何处分（也许顾虑事情闹大，于英国不利）。白克浩司惯于弄虚作假，伪造文件。他声称发现李莲英的日记，从1869年进宫当太监到1908年慈禧死亡止，先后四十年，内容比景善日记更精彩，更重要，但从不肯示人。他自称是“外国的荣禄”，与慈禧有私情，保存了给他的一些私信。他自我吹嘘与清朝大员、民国总统徐世昌熟识，美国钞票公司在中国的代表贺尔（G. Hall）信以为真，通过他订立了印制中国钞票的合同，合同上盖有徐世昌的印鉴。后来证明合同是伪造的，印鉴是假的，徐世昌根本不认识他。他还借口替牛津大学收购中国珍贵书籍，骗到一笔钱，使得经手人无法交代，十分为难。这些以及其他事件的揭露，对于认识白克浩司究竟是什么人，大有好处。

书中提供的白克浩司关于景善日记的自相矛盾的说法和情节，对判别日记的真伪很重要。白克浩司在《慈禧外纪》发表时的介绍和后来的补充说明，他说一看到手稿就能认出日记很有价值，读汉字草体并不困难，但给莫理循的信上却承认，他开始并不以为这份日记有什么重要性，只是濮兰德等人认为很有价值，他才认识到这点的。看草书和行书对他说来都有困难。刘逸生的文章质问他当时既是使馆工作人员，何以发现日记不向有关上级报告。于是他开列了一长串所谓“知情者”的名单，包括驻华公使萨道义在内。但这些人这时都已经去世，对此无法加以核实。特雷福尔一罗浚查遍窦纳乐和萨道义当年给英国政府的报告，没有一点迹象表明他们知道这回事。白克浩司说景善日记除译成英文已经发表者外，其余都是琐碎的和并不令人感兴趣的事，所以不曾公开。刘逸生反驳，如果日记是真的，即便如此，未发表部分仍然具有历史的和目录学上的价值。戴文达在此以前，也向白克浩司表示过愿意承担日记未发表部分的翻译出版工作，起先白克浩司同意了，当戴文达提出想看一看原稿时，他又借口自己要翻译，加以拒绝。几年后戴文达又表示愿意出钱购买这份原稿，白克浩司答复说原稿已经卖掉，因为经手人死亡，它在何处已无法查出。这个消息使濮兰德大为恼火，他写信责备白克浩司可以卖掉包括衬衫在内的一切东西，但决不能把未发表的日记稿本卖掉。白克浩司回答濮兰德，他由于生活困难，为了糊口，确实也把衬衣卖了。当濮兰德派人了解他在北京的生活状况，他却过着相当舒适的日子。他所说的还有一部分事情琐碎不令人感兴趣的原稿，其实也是骗局。这部分原稿连濮兰德在内，没有一个人见到过。

从我开始涉猎义和团的资料时起，也对景善日记的真实性发生怀疑。且不说程明洲、刘逸生举出的几十条史实错误，只凭其中关于刚毅的记述，足以证明日记不是景善所作的。刚毅当时是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吏部尚书，景善是退休多年、赋闲家居的侍郎。从日记里看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刚毅不但过节时向景善送礼，问候起居，而且常去景善家作客，将朝中大事和个人行动，坦率告诉景善，毫不隐讳。景善称刚毅为贤弟，对之十分佩服，刚毅来访时，留他吃饭。具有这样深厚情谊的人，日记中叙述刚毅的事按理不应该出大的错误，但实际情况却远不是这样。

1900年五月初（阴历），义和团运动已成燎原之势，清政府内部主剿主抚两种意见，严重对立。慈禧于五月初八日，先派军机大臣、刑部尚书兼管顺天府事赵舒翘与顺天府尹何乃

莹一道去涿州、保定“察看”义和团，了解情况，以便决定对策。两天后，又加派刚毅去涿州、保定，劝告、解散义和团。刚毅于十一日启程去涿州，十二日在寰店与赵、何相遇。他们商定赵舒翘先回北京，向慈禧报告情况，请求撤走在涿、保一带镇压义和团的聂士成部杨慕时的队伍，自己同何乃莹继续前往涿州、保定。刚毅五月十一日离开北京，直到十九日还没有返回，清政府这一天发出命令催他从速回京。据恽毓鼎记载，他是二十四日才回到北京的。《崇陵传信录》说：当天（指二十四日）清晨举行御前会议时，“（诸臣）俱集瀛秀门外，（慈禧）召二王（庆、端）及枢臣先入见。刚毅适还朝，亦召入。”恽毓鼎参加五月二十日以后的各次御前会议，关于刚毅回京日期的记载是可信的。但是景善日记对这些事情是怎么说的呢，现将有关段落摘抄如下：

“五月初五日……霍司门拿进刚相所赠之猪肉十斤，并问候予之起居。予尚未闻中堂与赵军机已由涿州覆，不知二公查办义和团如何了局。据价云，午后中堂拟来相谈一切。……不知刚中堂因何尚未请圣安，大约昨晚回京太迟，务俟明日方可覆命也。申刻，刚中堂来谈，留吃饭。……中堂等昨酉刻到京。已将神团一切情形，一总具缮底稿，明日递进。……”“五月十八日……刚相派价告知（昨夜间城内起火事）以及三更后同澜公前往顺真（直）（应作治）门洋堂，以便督催焚烧该处之义团等。……其烧之屋，几成山堆，澜刚二君，掩鼻而过也。黎明，刚君上朝。……”

日记里这些记述刚毅的事，是刚毅本人在景善家里亲自对他讲的，或者派人告诉的，都不是道听途说，得之传闻，照理不应该出错。但是五月初五日，清政府还没有要他和赵舒翘去涿州，刚毅也没有离京，日记里却出现他们一起返京覆命的记载。刚毅二十四日才返回北京，日记却说他在十七日夜间同载澜一道督促义和团焚烧宣武门内天主教南堂。十九日清政府催他回京，而日记却说刚毅十八日清晨已经上朝议事。日记里出现这样的怪事，不说明别的，只说明它决非景善所作，是别人假借景善名义编造出来的。日记的伪造者没有弄清楚清政府什么时候要刚毅去涿州、保定的，他是什么时候出京，什么时候回京的，所以发生了这样大的笑话。此外，日记还暴露伪造者对清朝制度、传统和宫殿名称等方面无知或者所知不多的重大弱点，而景善作为翰林院侍读、内阁侍读学士，历任户、工、礼、吏等部侍郎，这些他却是很熟悉的，即使到了晚年，也不至于弄错。他不可能把仪鸾殿写成鸾仪殿或仪鸾殿，把寿皇殿、瀛秀门写成皇寿殿、迎秀门，不可能违背清朝体制，把已经退休的大学士孙家鼐说成他参加了立储前的御前会议，慈禧还当众羞辱他一番。他不可能把军机拟旨、向例由领班军机大臣呈阅的事情搞错，他也不会把慈禧追查太监安得海被处死事不交慎刑司而交掌仪司办理。这些都是伪造的景善日记明显存在的破绽，熟悉掌故的人一眼便能看出。据说《慈禧外纪》出版后，一时景善成了中外知名的历史人物。当时金梁还在世，曾打算在《清史稿》里为景善立传，但看了日记后，立即打消这个主意。看来金梁看出其中的问题，因而改变想法的。

我读程明洲的文章后，相信景善日记是伪造的，但有些问题一直搞不清楚。例如伪造景善日记是白克浩司单独一个人还是有某个或某些中国人帮他一起搞的？又例如程明洲、珀塞尔都说，伪造景善日记有政治原因，它旨在为荣禄辩解，难道白克浩司真抱有这个目的吗？此外白克浩司叙述发现日记的经过，绘影绘声，娓娓动听，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看了原稿以后，又读特雷福尔—罗拔的专著，我认为这些问题比以前是清楚了。

景善日记“文笔粗陋”，字迹“枯涩”，程明洲把它作为一个重要方面用来否定日记为景善所作，是有道理的。日记里错别字多也是事实（例如有“彼侍甲兵，我侍天理”的话，侍应作“恃”。《义和团》辑录景善日记，侍改为“传”也是错的），景善即使年老，也不至于有那样多的笔误。此外还有半通不通的文句。但通观全文，总的说来，它虽然缺乏文采，文字还是通顺的，字迹也相当熟练、流利，书写的格式也同当时通行的相一致。我没有见过白克浩司用汉文写的文章和汉字，但是一个不是在中国长大的汉学家，能够写出那样高水平的中文或者那样熟练的毛笔字，我是怀疑的，何况白克浩司来中国的时间不算长，单独伪造的可能性更不大。我认为景善日记是白克浩司在中国人帮助下搞出来的，例如白克浩司姓孔的录事或者莫理循所说的白克浩司的中文教师，都有可能参与伪造日记的工作。这虽然仍是一种设想，不能证实。但是看了景善日记原稿以后，更使我认为这个假设是能够成立的。

景善日记旨在为荣禄辩解吗？日记里记述荣禄反对义和团，反对进攻使馆的事确实不少，但为什么不在荣禄在世时，特别1900年底和1901年初当列强强索所谓“祸首”时把日记公诸于世，那时对荣禄十分有利，而却在他死后六七年才发表出来，这时对荣禄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因此景善日记具有政治目的的说法看来是没有多少令人心服的根据。白克浩司所以过多地描绘荣禄，因为他是慈禧的心腹，对她有很大影响。而荣禄为人机诈、阴鸷、善变，富有统治经验和善于玩弄政治手腕，在当时的满族大员中很少见。白克浩司为了使日记生动、增加色彩和戏剧性，所以假借景善这个老朽之口企图把当时处于关键地位的荣禄这个人物突出出来。因此，我的初步看法是景善日记不象程明洲等人所说的那样，具有为荣禄辩护的政治目的。至于白克浩司关于日记发现经过的说明，我同意特雷福尔—罗浚的意见，日记是伪造的，发现日记的说明也是捏造的。他说：“一旦同意白克浩司提出的日记是假的，我们除了把他发现的故事看成空想以外，没有别的抉择。”对一个伪造文件的人，没有道义上的理由说他不会伪造发现日记的故事。无论谁伪造文件，为了使人们相信伪造的文件是真的，他必然同时要伪造历史，硬说它也是真的，而其实它必然也同样是假的。⑦

关于景善日记，我认为可以这样说，景善日记是假的，白克浩司发现日记的整个过程也是假的。这份日记是白克浩司在中国人帮助下伪造出来的。它并没有为荣禄辩解的政治目的。在结束本文前，提出两点建议：

第一，在刘逸生、程明洲发表文章以后，景善日记是伪作，证据确凿，它决不是什么重要文献资料。除非有充分论据驳倒这个论断，我们继续把它看作是可信的史料，显然是不恰当的。除了中国研究者外，六十年代起，研究义和团的外国学者对景善日记编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九种《义和团》也提出批评意见。⑧景善日记既然是伪造的，建议将来重印《义和团》这部资料书时，应该果断地坚决地把它删去。

第二，特雷福尔—罗浚的《北京的隐士》是一部严肃的著作。作者为了弄清事实，不辞辛劳地访问了在世的可能提供线索的“口碑”，看了能找得到的有关白克浩司的私人通信和资料，查阅了英国外交部、造船厂以及其他公私档案，化了几年时间，终于写出了这本关于白克浩司的传记，揭发了他荒诞离奇的一生。我很希望有人能把它译出问世，供国内研究者参考利用。如果目前出版这样的书籍有困难，建议可否由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在会刊上先将其中有关景善日记的部分翻译出来发表。我想，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者对此一定会表示欢迎的。

一九八二年八月廿八日

关于义和团源流研究的几点体会

程 啸

近年以来，学术界对义和团源流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报刊上出了一批有质量的文章，就这一问题开展了多方面的探讨。各种不同的意见，也逐渐明朗化了。无论那一种意见，都至少是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在把研究引向深入，从而使义和团这一相当复杂的组织，逐步地得到接近于历史真相的反映。这一问题的研究和新成果的取得，对于进一步去认识义和团运动的地位、性质和风貌，阐明这场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有着重要价值。我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还刚刚起步，为了向同志们求教，现把自己在探索过程中的几点体会提出来，请大家批评指正。

第一，对于组成义和团的几个主要组织流派，似应进行分类研究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再作进一步的综合研究，以便找出义和团运动在组织上的主流。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义和团反侵略运动是由历史上某些现成的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所共同掀起来的。参加这场运动的流派非常复杂。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民间教门、秘密结社、拳场、乡团等等不同类型和性质的组织，都打出了义和团的旗帜。要弄清楚这些组织中谁是义和团的主干，应该分别察考这些组织的性质和特点，探讨它们在历史上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研究它们在民族矛盾上升的条件下怎样转变为反侵略的团体，以便进一步对它们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恰当的估计。就是说，先掌握义和团组织源流的各个侧面，才有可能在研究个别事物并进行分析比较的基础上，达到对义和团源流的总体认识。

~~~~~:: :: ::~~~~~

## 注：

①1939年北平印了烫金的装帧精美的新版《慈禧外纪》，由里奇（Sheldon Ridge）

写了《出版者叙言》，主要内容根据白克浩司的补充说明，为景善日记作辩护。

②③见程明洲：《所谓景善日记者》。

④特雷福尔—罗泼《北京的隐士》，182页，纽约，1977年。

⑤珀塞尔：《义和团起义》，324页，剑桥大学版，1963年。

⑥特雷福尔—罗泼：《北京的隐士》，194页。

⑦《北京的隐士》，209页。

⑧《义和团起义》，279页。



目前学术界对于义和团的来源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即使对于义和团前史中的某一个组织的性质和特点，也往往众说纷纭。究其原因，在于义和团的来源既相当复杂，而有关的史料记载却过于粗陋，从而阻碍了我们对组成义和团的各个流派，作历史的和全面的考察。拿早期义和拳这一组织来说，研究者常常引用的，就是《高宗实录》中那几条片断的史料。而这几条史料，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不同理解的。例如：对于《实录》中关于乾隆四十三年杨四海义和拳一案的记载，人们可以根据其中“义和拳邪教”一句推断义和拳为教门；也可以根据其中的学拳防夜一句论证义和拳是拳会。由于局限于对某一条（某一种）片断史料的不同解释，而缺乏对事件的全过程作必要探索，就很难将历史的真相搞清楚。

为此需要更多的占有资料，进行必要的史料钩沉和考证。历史上的义和拳案，有的是真案，有的是假案，有的虽然反映了义和拳的某些活动，但记载和事实有很大出入。对这些复杂的案件要作过细的辨析。拿杨四海一案来讲，它就是一种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这个案子发生在乾隆四十三年，在案发的前四年，即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爆发了王伦起义。王伦是清水教（即八卦教）在临清一带的教首，他在清水教中分设文场和武场，文场宣传八卦教的信仰，武场练习义和拳作为起义的武教。当时的官方文档对王伦的这一套组织有不少记载。据此大体可以肯定早期的“义和拳教”是八卦教在组织农民起义时形成的一种武术结社。王伦起义在直鲁豫等省有很大的影响。这次起义之后，作为秘密结社的义和拳在这些省分流传开来。同时，也有些亡命徒借告发“王伦余党”希图邀功或挟嫌诬扳。这就使得当时的义和拳案的情况十分复杂。告发杨四海的张九锡，是一个山西籍小贩，他为了希图耸听，将杨四海等几个普通的民间习拳者说成是义和拳。《高宗实录》的那篇上谕，就是张九锡“希图耸听”的结果。因而在行文中出现了既把义和拳当成“邪教”，又说它的作用是“看门守夜”这种含敬和矛盾的说法。其实，这篇上谕只反映了整个案件的一个侧面，据其他有关记载看，杨四海练习的是民间拳种，名叫红拳。当时直鲁豫等省有不少练红拳的拳场，这些拳场本身的作用确实只限于守门防夜，自卫身家。它们和宣传灾劫，“左道惑众”的“义和拳教”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因此，我们对于官书上关于早期义和拳的那些片断记载，可以作为研究的起点，而不应当当成结论的依据。只有从这些史料出发，结合当时的背景，尽可能把所述有关案件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才能对早期义和拳的性质、作用和风貌，作出比较恰当的描述。

早期义和拳和义和团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山东冠县是早期义和拳的故乡。冠县反教会的花拳，本名就叫义和拳。早期义和拳的某些咒语和风习，后来在义和团运动中再度出现。这些迹象表明早期义和拳和反洋教的义和拳不仅是名称上的偶然雷同。然而，义和团又不是义和拳的简单和直线的延续。大刀会和红拳，特别是神拳在义和团运动初起时的地位都很重要。近代历史上的山东兖州府一带也出现过名叫“义和团”的团练。所以，义和团的组织源流到底是什么，恐怕要对以上的各种组织，分别进行历史的和全面的考察。上而举的义和拳一例，不过说明这种考察的必要性而已。

第二，把对山东义和团源流的研究，和对全国下层人民反抗运动的组织形式的研究，结合起来。

目前义和团源流史的研究上有一段空白，就是对道光朝到甲午战前这一段时间的拳会活